



# 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

说来惭愧，作为一名前中文系学生，《诗经》我读的不多。熟悉且能娴熟引用的，便是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”。

依稀记得这首诗是中学课本上的，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”但凡受过九年义务教育就能读懂的16个字，却是《诗经》中最出色的文字之一。

大白话版的16个字，来与往，杨柳与雨雪，对比鲜明，写出了季节变化，写出了征途遥远，写出了时光流逝中的惆怅忧伤。

自此之后，柳树便在后世文人的笔下四处开花，成为折柳寄情、惜别、思归之发端。

这其中，最著名的，便是折柳赠别。《三辅黄图》，这是一本成书时间不详但不晚于魏晋南北朝、记载秦汉时期关中地区地理风貌的志书。书曰“灞（或作霸）桥在长安东，跨水作桥。汉人送客至此桥，折柳赠别。”这是目前所见“折柳赠别”之事最早的记载，也就是说，在汉代的首都长安，亲友要出远门了，大家习惯送至灞桥时，折一枝柳作别。这一送，这一折，便是千年光阴。

李白笔下的“送君灞陵亭，灞水流浩浩，上有无花之古树，下有伤心之春草。”“年年柳色，灞陵伤别。”便说的是此情此景。

只不过，送到灞桥可以理解，长安城是当时的首都，是政治文化中心，灞桥处在交通要道上。但是，为什么一定要折柳而不是其他园林景观植物呢？柳树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

翻遍资料，发现前人的说法大概有如下几种：

其一，取“柳”的谐音“留”，以“折柳”表达惜别、希望对方留下的意思。但是说到这，就有一事甚为不解，老祖宗的家宅讲究一个“前不种桑，后不种柳”，据说因为“桑”和“丧”同音，有引来丧事之嫌；“柳”和“流”同音，有家财外流之虞。同样是谐音梗，怎么如此反复无常？

其二，柳树生命力旺盛，具有“断而复生”的特性。晋代葛洪《抱朴子》有“夫木槿杨柳，断植之更生，倒之亦生，横之亦生。”——就说木槿啊杨柳啊，断了能再活，倒着能成活，横着也能成活。钱钟书就曾在《管锥编》中写道：“汉以后送别有折赠杨柳之俗，取意难推，或即以杨柳‘易生之木’为说……颇具思致。”从这个角度来说，送柳枝就是祝福对方即使遇到挫折也能“断而复生”，以及走哪儿都能入乡随俗、落地生根茁壮成长，这祝福很实在。

其三，这与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树神崇拜传统有关。柳树则被赋予了驱鬼辟邪、保护生灵的寓意。过去古人有清明簪柳等习俗，给出远门的人送一支具有辟邪平安意义的柳枝，也算是合情合理。

就这么着，送行的人，把灞桥的柳树从汉朝一直折到唐朝，一千年来过去了，柳树也没折完，又一千多年过去，今日灞桥依旧杨柳依依。可见柳树的生命力，确实旺盛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除了临别相赠，古人还有寄柳盼归的习俗。李白《折杨柳·垂杨拂绿水》：“美人结长想，对此心凄然。攀条折春色，远寄龙楼前。”张九龄《折杨柳·纤纤折杨柳》：“纤纤折杨柳，持此寄情人。一枝何足贵，怜是故园春。”李贺《致酒行》：“零落栖迟一杯酒，主人奉觞客长寿。主父西游困不归，家人折断门前柳。”

## 秦味



馄饨是我国北方地区的一种传统美食，历史悠久，深受劳动人民喜爱。在中华美食的瑰丽殿堂中，韩城馄饨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珠。它以精细的制作工艺、独特的口感和深厚的文化内涵，吸引了无数食客的美味。韩城馄饨不仅是一道美食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和文化传承。

## 韩城馄饨

韩城馄饨又叫臊子馄饨，馄饨有团圆美满之意，是韩城人过年过节、男婚女嫁、老人祝寿、孩子满月等盛大场合招待亲朋好友和贵宾的待客饭。

韩城馄饨的制作过程并不复杂，包括准备馅料、捏好馅皮、煮蒸馄饨三个步骤。首先，将猪肉、萝卜等食材剁碎，加入适量调料搅拌均匀，制成馅料。其次，将面粉和水按照一定比例和成面团，擀成薄片，切成方形面皮的馄饨皮。最后，捏取黄豆般大小的馅料放在面皮上，由下向上折起三分之一，再向上折一次，然后以中指为轴，用拇指和中指将两端捏合，形成一个中间空心的小元宝。捏好的馄饨要一个挨一个地放在刷过油的篦子上，摆放整齐，不能太密，否则下一步煮熟的过程中馄饨就会粘连在一起，容易破皮，影响口感。蒸熟的馄饨外圆中空，精巧细致，形如元宝坐佛。春节吃馄饨的习俗一般要延续到正月十五，所以馄饨煮熟后必须晾干，便于存放。

烩馄饨汤是一道“只可意会而很难言传”的特色菜。需要在制作过程中严格把握好臊子汤的火候。首先架锅烧油，炝入生姜、葱花，放花椒粉、胡椒粉，再滴入少许老抽调色，然后加入开水和熬好的鸡汤，放入提前炒好的臊子（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炒制）、西红柿、油炸豆腐丝、海带丝、木耳丝、黄花菜等，最后放入白菜、菠菜、韭菜等，锅开后关火，加几滴香油和少许虾米。一锅色泽鲜亮、搭配多彩、香气扑鼻的馄饨汤就做好了。

品尝一碗热气腾腾的韩城馄饨，仿佛能感受到这座古城的脉搏和历史沉淀。那独特的口感和丰富的文化内涵，让人不禁为之陶醉。而那馄饨中蕴含的家的味道和情感，更是让人回味无穷。

韩城馄饨之所以名扬四海，不仅仅是因为其美味可口，更因为它承载着韩城人民对家乡的热爱和自豪的象征。这道美食融入了韩城人民的生活，成为与外界交流的一张文化名片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韩城馄饨所承载的那份家乡情怀和文化底蕴始终如一。许多游客不远千里来到韩城，就是为了品尝一碗正宗的韩城馄饨，感受那份独特的家乡味道。

李泽仁

当然除了长安，其他地方也有折柳赠别的习俗。有意思的是，当时东都洛阳有一座洛桥，也称为天津桥，也是送别的热门场地。孟郊有诗曰：“天津桥上冰初结，洛阳陌上人行绝。榆柳萧疏楼阁闲，月明直见嵩山雪。”温庭筠也有《清平乐·洛阳愁绝》写洛桥离别，词曰：“洛阳愁绝，杨柳花飘雪。终日行人恣攀折，桥下水流呜咽。上马争劝离觞，南浦莺声断肠。愁杀平原年少，回首挥泪何行。”

查阅资料的过程中，我发现，古人往往是杨柳并称，甚至用杨柳来解释柳。《说文解字》的解释是：“柳，小杨也。”《康熙字典》对此还作了注解：“杨柳一物二种，《毛诗》分而言之者，《齐风》‘折柳樊圃’，《陈风》‘东门之杨’是也。合而言之者，《小雅》‘杨柳依依是也。’还引用了《本草纲目》，进行详细解释，说“杨枝硬而扬，故谓之杨；柳枝弱而垂流，故谓之柳，盖一类二种也。”

大概就是这个“弱而垂流”吧，柳树还有形容美女的意思，比方柳叶桃艳，就是形容女子貌美。但是吧，就像“小姐”这个词一样，“柳”用来指代美女的词汇，到了后期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，开始多用来指代娼妓，而“柳絮”也被引申为薄情。比方柳叶花门，是妓院别称；柳市花街、柳巷花街都是指妓院聚集之处。眠花宿柳、寻花问柳，也都不是什么好词。

说到柳絮，在诗人画家笔下，“捉柳花”是非常常见的闲适意向。比方唐人白居易的“谁能更学孩童戏，寻逐春风捉柳花。”宋人杨万里的“日长睡起无情思，闲看儿童捉柳花。”后来，明人仇英画了《捉柳花图》，既有儿童嬉戏，又有文士闲看，更有杨柳依依，绿草成茵，清池涟漪。

杜牧的这首诗正是写送荔枝之事。妃子笑，专使骑马来也，驿马到，荔枝来也。杜牧正是用他的如椽之笔，对此事进行了绝妙讽刺。但对于诗中的“一骑红尘”，一些选本及工具书的解释就值得商榷了。一人一马谓之“骑”，此无歧义；问题就出在“红尘”上。且举三例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《历代名篇选读》谓“红尘”：指快马飞奔时蹄下扬起的尘土。“红尘”字未释。社科院文研所社版的《唐诗选》中谓：“红尘”，带红色的尘土。上海辞书出版社《唐诗鉴赏辞典》谓：

……接下来，又是两个特写的镜头：宫外，一名专使骑着驿马风驰电掣般急奔而来，身后扬起一团团红尘；宫内，妃子嫣然一笑，宝马蹄飞尘起，颜色相辉映；一个径直通道，一个虽说马蹄下扬尘的颜色，而寓意自明。

只是华清宫所在地的唐代昭应县境，并非红土，而是一例的黄土地。途经华清宫的长安至洛阳的“两京大道”，路面自然也与红无涉，该组诗第二首起句“新丰绿树起黄埃”可徵也。因之诗中的“一骑（一人一马谓之骑）红尘，当指身着朱衣的专使飞

马送荔枝时身后扬起尘土，故从远处望去，人着衣在尘中，故曰：红尘。”小杜牧十九岁的诗人曹松，在《及第赦下献座主杜侍郎》诗中有句云：“门前送客朱衣吏”，说的就是自己考中进士后，小吏送来了“录取通知书”（“敕”，皇帝的命令）特指与其身份相同传达荔枝的驿吏，也是身着红衣。

盛唐卢象有《驾幸温泉》诗云：“传闻圣主幸新丰，清跸鸣鸾入禁中。细草修林随步辇，垂杨几处绕行宫。千官扈从骊山北，万国来朝渭水东。此日小臣徒献赋，汉家谁复重扬雄。”

这首诗写唐玄宗驾幸温泉宫的豪壮场面，以希望自己受到重用的感叹作结。温泉就是骊山温泉宫，系由温泉宫更名而成。玄宗开元十一年置温泉宫，后又于天宝六载（747）更名为华清宫。

温泉宫在骊山。唐玄宗去温泉宫游幸，规模甚大，“八十一车千万骑，朝有宴饗暮有赐”。等于把长安政府机关搬到了这里。玄宗在开元后期，尤其是天宝四载（745）册立杨贵妃后，每年避暑都要去温泉宫（即后来的华清宫）愈住时间愈长，最长的竟达九十六天。从天宝六载（747）冬起，新命名的华清宫，实际上成了另一个行政中心，其时外国时节的朝贺活动，也在此举行。“千官扈从骊山北，万国来朝渭水东”，说的就是这种盛况。

“万国”，言众多外国的使节，“朝”巨见君为朝。在这里，须知“渭水东”指的正是温泉宫。渭水横贯关中原，至潼关汇入黄河。总体流向是由西向东方向。那为何要称渭水东呢？原来，渭水在骊山西北近处，即呈西南东北流向，凡四十余里，骊山华清宫位于渭水东南，故云。此种说法，大抵因袭“江东”之说。长江在今安徽芜湖至江苏南京，呈西南东北走向，芜湖以东的江南地区，就有了江东、江左之名。《三国演义》中诸葛亮舌战群儒就多处提到“江东”。明乎此，人们也应赞赏诗人的观察之细，语语之新，效果之美了。

白居易

晚唐诗人杜牧有名作《过华清宫绝句三首》，其一云：“长安回望绣成堆，山顶千门次第开。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”

诗中的“妃子”指杨贵妃，她喜食荔枝。而荔枝产在南方，食用佳期很短。曾在荔枝产地蜀中忠州任刺史白居易，在《荔枝图序》中就说：“荔枝”若离本枝，一日而色变，二日而香变，三日而味变，四五日外，色香味尽去矣。”

但为了杨贵妃的口腹之欲，朝廷也不惜路途遥远、运送艰难，而乐此不疲。这就是《新唐书·杨贵妃传》所云：“妃嗜荔枝，必欲生致之，乃置驿传送，走数千里，味未变已至京师。”这也正如后来苏轼《荔枝叹》诗所云：“宫中美人一破颜，惊尘溅血流千载。”并在诗中自注：“唐天宝中，盖取涪州荔枝，自子午谷路入。”

杜牧的这首诗正是写送荔枝之事。妃子笑，专使骑马来也，驿马到，荔枝来也。杜牧正是用他的如椽之笔，对此事进行了绝妙讽刺。但对于诗中的“一骑红尘”，一些选本及工具书的解释就值得商榷了。一人一马谓之“骑”，此无歧义；问题就出在“红尘”上。且举三例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《历代名篇选读》谓“红尘”：指快马飞奔时蹄下扬起的尘土。“红尘”字未释。社科院文研所社版的《唐诗选》中谓：“红尘”，带红色的尘土。上海辞书出版社《唐诗鉴赏辞典》谓：

……接下来，又是两个特写的镜头：宫外，一名专使骑着驿马风驰电掣般急奔而来，身后扬起一团团红尘；宫内，妃子嫣然一笑，宝马蹄飞尘起，颜色相辉映；一个径直通道，一个虽说马蹄下扬尘的颜色，而寓意自明。

只是华清宫所在地的唐代昭应县境，并非红土，而是一例的黄土地。途经华清宫的长安至洛阳的“两京大道”，路面自然也与红无涉，该组诗第二首起句“新丰绿树起黄埃”可徵也。因之诗中的“一骑（一人一马谓之骑）红尘，当指身着朱衣的专使飞

马送荔枝时身后扬起尘土，故从远处望去，人着衣在尘中，故曰：红尘。”小杜牧十九岁的诗人曹松，在《及第赦下献座主杜侍郎》诗中有句云：“门前送客朱衣吏”，说的就是自己考中进士后，小吏送来了“录取通知书”（“敕”，皇帝的命令）特指与其身份相同传达荔枝的驿吏，也是身着红衣。

盛唐卢象有《驾幸温泉》诗云：“传闻圣主幸新丰，清跸鸣鸾入禁中。细草修林随步辇，垂杨几处绕行宫。千官扈从骊山北，万国来朝渭水东。此日小臣徒献赋，汉家谁复重扬雄。”

这首诗写唐玄宗驾幸温泉宫的豪壮场面，以希望自己受到重用的感叹作结。温泉就是骊山温泉宫，系由温泉宫更名而成。玄宗开元十一年置温泉宫，后又于天宝六载（747）更名为华清宫。

温泉宫在骊山。唐玄宗去温泉宫游幸，规模甚大，“八十一车千万骑，朝有宴饗暮有赐”。等于把长安政府机关搬到了这里。玄宗在开元后期，尤其是天宝四载（745）册立杨贵妃后，每年避暑都要去温泉宫（即后来的华清宫）愈住时间愈长，最长的竟达九十六天。从天宝六载（747）冬起，新命名的华清宫，实际上成了另一个行政中心，其时外国时节的朝贺活动，也在此举行。“千官扈从骊山北，万国来朝渭水东”，说的就是这种盛况。

“万国”，言众多外国的使节，“朝”巨见君为朝。在这里，须知“渭水东”指的正是温泉宫。渭水横贯关中原，至潼关汇入黄河。总体流向是由西向东方向。那为何要称渭水东呢？原来，渭水在骊山西北近处，即呈西南东北流向，凡四十余里，骊山华清宫位于渭水东南，故云。此种说法，大抵因袭“江东”之说。长江在今安徽芜湖至江苏南京，呈西南东北走向，芜湖以东的江南地区，就有了江东、江左之名。《三国演义》中诸葛亮舌战群儒就多处提到“江东”。明乎此，人们也应赞赏诗人的观察之细，语语之新，效果之美了。

白居易

# 「一骑红尘」 「渭水东」

## 西安建筑的“龙”

龙是中华文化的象征，又是华夏的图腾和标记，因而中国人自称是“龙的传人”。不仅如此，龙还是力的象征，具有祥瑞和谐之气。建筑，作为一种形式和载体，自然与龙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建筑中的龙，表达了人们对吉祥和美好的追求。

漫步古城西安，你会发现不少与龙有关的建筑。西安的钟楼、鼓楼以及四大街门楼上，其垂脊和正脊上都有龙的身影。传说中“龙生九子”，各司其职。建筑垂脊上的动物叫走兽，屋脊两端的龙头称为“鸱吻”（chī wǎn），它好吞好望，屋脊之上的它作张口吞脊状，用以灭火镇灾，确保平安，是屋顶尊贵、祥瑞的独特装饰。

走进西安碑林或小雁塔，人们可以看到许多巨大的碑石驮在形似巨大石龟的背上，十分有趣。其实，这个力大无比、特别能负重的动物不叫龟，它有一个很高雅的名字叫“赑屃”（bì xì），相传它是龙的九子之一，有着坚强的性格，总是奋力地向前走，不停步。在中国古代，赑屃常被用于装饰石碑，特别是那些具有重要历史和艺术价值的石碑，以赑屃做底座，更加增添了碑的庄重感与典雅感。

龙的形象在桥梁上也很常见。西安东郊的古灞桥，全长400米，共有80多个桥孔，是我国建造时间最早、规模最宏伟、桥面跨度最长的一座大型多孔拱桥。桥墩用质地坚硬的石条砌成，桥墩的两头和桥拱上方，镶有造型精美的巨型石雕龙头。石拱桥上的龙头称为蛟螭（gōng fū），是龙的又子，生性好水。龙头张嘴，作排水用；另外，放于桥上，以护佑桥身。灞河上的古桥虽已废弃，但人们仍可看到一些遗存下来的石雕龙头。在西安南门外护城河上，有东西两座桥，在桥两侧护栏上，南北两端共卧有8条蛟龙，龙头龙须龙爪，清晰可见，形态逼真——龙身盘卷，龙鳞突出，刀功练熟，栩栩如生，显示了浑厚、细腻、严谨、俊逸的石雕风貌，可称为艺术品。在桥的栏板上同时镂空雕刻有60个蛟龙的形象，它们被视为能够控制雨水的神兽。蛟龙卧于波涛之中，奋力与水搏斗，象征着威武、智慧、繁荣和安宁，给人们带来吉祥和幸福。

临潼的华清池，殿宇辉煌，楼台掩映，历来为人们所向往。西院有一个大水池，叫九龙池，又名九龙浴。池南有一座坝坝式石桥，石桥上嵌有九个龙头，水从龙口中流出，引得游人纷纷驻足观看。此处还有一座龙船，船头两条龙昂首挺胸，巨嘴大张，意气风发，神情生动，深为游人所喜爱。移步曲江池遗址公园，里面有一处景观叫“白龙吐涎”，这座高5米的龙头石雕，安卧于湖边的草坪之中，白色的龙头昂首朝天，口中喷出高高的水柱射向湖中。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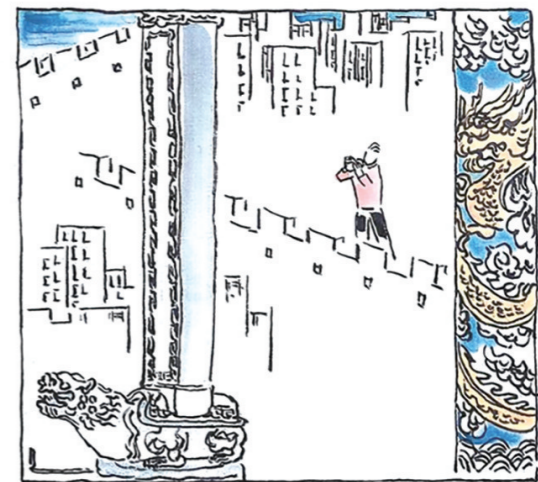
多游客划船至此，纷纷从龙口喷出的水柱下穿过，图个开心快乐，图个吉祥如意。在西安兴庆宫公园地标性建筑龙堂中，有一座“飞龙在天”的青铜雕塑，长宽各8米，只见龙头高高扬起，气宇轩昂，龙身起伏，龙爪挥舞，游动于波涛云海之中，大有一飞冲天之势，是一件难得的艺术品。

古语云：“柱之言主也，屋子主也。”柱，作为建筑物的一个主体构件，起着支撑房屋全部重量的作用，有了它高楼大厦才能高高耸立，巍然屹立。龙柱是建筑的一种装饰造型，更能彰显建筑之美。在西安柏树林街道有一座卧龙寺，寺内的三门殿有两根立柱，上面各缠有一条近6米高的彩龙，由柱直通往屋梁，可谓顶天立地，这两条彩龙的头相互对应，向外伸出，龙口大开，活灵活现，诠释了特有的建筑美学。无独有偶，在西安未央区龙首村，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商业街，街的东口高高耸立着两根直径约1米、高约10米的龙柱。此柱用现代材料做成，呈古铜色，伫立在1米多高的莲花座上，很是壮观。每根柱上均有两条巨龙缠绕，一龙头朝上，另一龙头向下，龙鳞片如鲤，龙爪紧贴立柱，更有层层回环不断的水波和云朵，只见龙跃然飞腾，大有遨游云天之势。造型精美的龙柱，给街头增添了许多美感。

西安龙首原被称为群龙聚集之地，相传古时有一条巨龙从秦岭山中冲出，在渭河戏水之后转头而卧，龙首原就是这条龙头。今日的地铁二号线地铁的龙首原站，就建在这龙首之上，走进地下一、二层站台，会发现大厅的柱子正上方装饰有30个直径50厘米的西汉瓦当状青龙雕塑，古朴而典雅。尤其醒目的是地下一层大厅西侧的一面龙墙，上面布满了祥云、海水，可谓龙的世界。其实，在近百平方米的墙面上并没有出现龙的形象，而是写满了各种字体的“龙”字，还有杜甫、韩愈、辛弃疾等唐宋诗人关于“龙”的诗词，真是别开生面，独具匠心。人们在这里驻足，品读唐诗宋词，欣赏书法，回味着关于龙的故事，真是美妙之极。

西安是十三朝古都，自古为龙脉之地，这些建筑中的龙文化和元素，反映了西安人对龙的喜爱和崇拜。

王雄文



## 张清益：创办义仓第一人

他是带领雷庄乡仅有的20多户村民在边区创办义仓的第一人，他是中共中央机关报《解放日报》经常在头版报道的先进典型，他就是1903年出生于新正县长舌头区雷庄乡（今旬邑县马兰镇雷庄村）一个穷苦家庭的张清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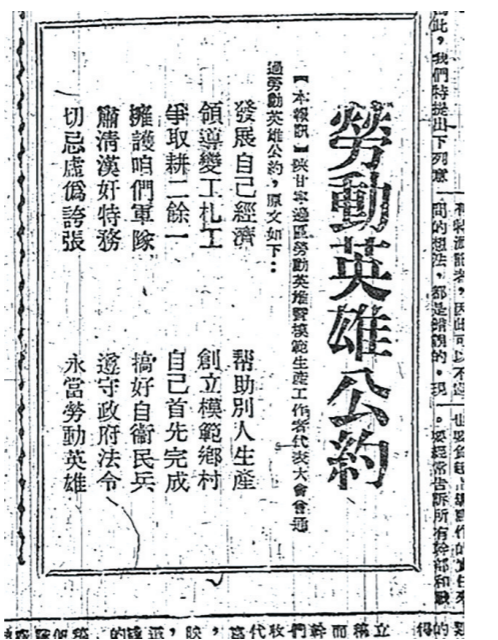
1933年，中国工农红军在雷庄乡一带打土豪、分田地。张清益除祖上遗留的7亩地外，又分得了30亩土地，从一个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的雇工，变成了一个拥有自己土地、自主支配生活的主人，因此他打心底里感谢党的恩情，积极参加并努力完成党分配给自己的各项工作。由于工作成绩突出，1935年雷庄乡成立苏维埃政府时，张清益被选为乡主席，同年又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他在任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期间，积极组织群众，组织开荒队，带领大家开荒种地，发展生产。

1940年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经济封锁，加之天灾和大量难民流入，关中分区经济出现困难，粮食严重不足。陕甘宁边区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，开展了大生产运动。到1941年，随着大生产运动的开展，粮食增收，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，张清益萌发了一个想法：“如果发动大家投工开出一块公共的荒地，公地种的粮食归大家所有，统一储存使用，逐年积累起来既可防灾备荒，又能支援抗战，这该多好。”他把自己的想法提出后，立刻得到全村的一致拥护，大家还纷纷对此提出意见建议。1942年初春，全县开会安排大生产运动计划时，张清益把他的想法和群众讨论的办法向县委作了汇报。县委书记史梓铭听后大加赞赏，给予了大力支持，鼓励他回去后组织群众大胆开办。

回乡后，张清益在群众大会上动员群众开义田、办义仓，提出第一年先在本乡开义仓20亩，所有15岁以上、50岁以下的劳动力，每人给义田出工25天。到了1942年3月底，实际完成义田32亩，当年净收义仓粮1600斤。翌年春，用这些义仓粮解决了部分缺粮农户的春荒问题，保障了生



张清益



这是雷庄乡苏维埃政府颁发的劳动英雄公约，张清益是公约的起草人。

产的顺利进行。

雷庄乡创办义仓的经验在新正县传开后，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，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开展。张清益决心扩大试办范围，利用集日公开讲演，号召各乡群众开义田、办义仓。在他的组织领导下，1943年，雷庄乡建义仓5处，开义田65亩，共收得义仓粮5000多斤。不久，长舌头区也建立起了23处义仓，开荒田400多亩。

义仓的建立大大激发了群众的生产热情，1943年陕甘宁边区和西北局号召进一步掀起大生产运动热潮，张清益开义田、办义仓的创举在关中分区推广，各县普遍开展起“向张清益学习，建立义仓，防备荒年，支援战争”的群众运动。从4月10日到5月1日，关中分区开义仓田16000多亩。

张清益的创举赢得了党和边区政府的称赞，被关中分区、陕甘宁边区评为“劳动英雄”“边区特等劳动英雄”，出席了1943年11月召开的第一届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和1944年12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，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。《解放日报》还以“张清益创办义仓”为题报道了他的先进事迹。1945年6月边区政府发出了《关于普遍建立义仓的命令》，由张清益在新正县首创的义仓在边区23个县得以普遍建立起来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张清益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，以旺盛的革命精神，全身心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中，他说“党员，在我心目中就是人民的伙计。一不能占上求官主义，二不是图财主义，三不为扬名主义，就要的一个革命主义”战争年代，大家一个心眼为革命，谁还想过官呀名呀这些事？所以一个胜利接一个胜利，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，要是不能把一切环节都看成革命，要是丢掉‘为了革命’这个心眼，那么建设的步伐就加不快。”后来，他辞掉了互助组组长职务，返乡参加农村建设事业，从互助组组长开始，到初级社、高级社主任，直至大队党支部书记，一直奋战在农业生产第一线。

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